

# 南豆角古道千年文化内涵挖掘及复兴实践研究

李俊茜, 葛紫阳, 豆一纯, 吴露露, 王晨瑜, 吕明凤  
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中国

**【摘要】**南豆角古道是拥有千年历史的文化长廊, 作为古代商贾贸易要道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见证, 穿长安区子午街办子午峪口, 兼具优美自然风光与深厚文化底蕴。随着现代交通兴起, 古道渐失往日辉煌, 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着手于以文献考证与口述历史采集为核心方法, 系统梳理古道文化脉络与价值核心: 文献层面, 结合《史记》等史料及考古资料, 厘清古道军事要塞、商贸干线、文化驿站的多重职能, 印证“一骑红尘妃子笑”历史事件真实性与“火烧栈道”典故起源; 口述历史层面, 挖掘村民祖辈流传的古道商贸往事、社公爷信仰传说及古建筑保护相关回忆, 填补文献记载细节空白。研究发现, 古道文化内涵集中体现为物质文化遗产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与文化线路枢纽价值。

**【关键词】**南豆角古道; 文化挖掘; 文献考证; 口述历史; 物质遗存

**【基金项目】**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培华学院 2025 年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古道新韵·南豆角村古道文化旅游复兴计划(编号: PHDC2025041); 陕西省体育局 2025 年常规课题《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陕西民族体育非遗的共同体意识传播创新研究》(编号: 20251240)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南豆角古道是千年文化长廊, 既是古代商贸主要通道, 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关键见证, 穿长安区子午街办子午峪口, 风景秀丽、文化内涵浓郁。现代交通出现后, 古道渐失光彩, 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资源未被全面发掘利用。国家推行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文化保护以保护为根基、传承为重点、更新为路径、产业为翅膀、惠民为本质, 构建全方位政策导向体系, 核心是“塑造形态, 铸造灵魂”。

物质文化遗产方面, 重点保护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及农业灌溉工程遗产, 划定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 以“绣花”式微改造保存乡土风貌; 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 开展农耕文化传承活动, 推进传统工艺振兴工程, 扶持传承人授艺, 打造非遗工坊, 促进戏曲曲艺、民俗节庆等活态文化传承, 同时加强红色文化守护, 激活乡村红色基因, 构建多元文化共存的守护格局。子午古道作为文化遗产, 其活化需适应时代需求, 而南豆角古道在资源挖掘方面存在不足。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为同类古道文化挖掘提供“文献+口述”双重视角的研究思路, 丰富古道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 1.2.2 实践意义

为南豆角古道的文化保护与文旅开发提供具体参考, 助力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学界已形成部分关于子午古道和南豆角村古道文化的研究成果, 多聚焦于南豆角村古村落保护开发及子午古道文旅价值探讨。刘麟鼎在《如何振兴历史村落的发展——以西安南豆角村为例》中, 以陕西西安南豆角村为案例, 探究历史村落振兴与地方经济发展路径[1]; 陈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景观改良加强研究——以秦岭北麓南豆角村为例》中, 结合乡村振兴背景, 融合村落环境、地域文化与产业结构, 探讨乡村景观改良加强策略[2]。

冯思远、杨湘涛在《论子午古道的文化景观旅游价值》中指出, 子午道连接南北、历史悠久, 在各历史阶段均发挥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传播及商贸流通作用, 形成丰富文化遗产, 周边散布的诸多文化遗迹具备很高的科研、景观艺术、生态及经济价值, 了解其当代价值是开发利用与推动文化景观旅游发展的关键[3]; 王曼利在《子午道古今价值论》中表明, 子午道在古代中国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表现卓越, 如今诸多古道或衰败或重新开发, 但已开发古道的价值未被完全发掘, 对南豆角村等古村落的历史文化考察与保护力度不足

[4]。

#### 1.4 研究方法

着手于采用口述历史法与文献研究法相结合的方式，其中口述历史法包含村民访谈、问卷调查、物质遗存勘察及文献与口述互证；文献研究法涉及地方志、古籍、碑刻铭文、官方文书等资料的收集、整理与校勘。

### 2.南豆角古道的历史沿革与核心遗存

#### 2.1 古道地理区位与历史脉络

##### 2.1.1 地理走向、穿越区域及自然环境基础

南豆角古道位于秦岭北麓长安区子午街道，是子午古道北出秦岭的重要节点，被誉为“关中腹地和陕南巴蜀的旱路码头”。古道以终南山子午峪为天然廊道，北端始于南豆角村，向南穿子午峪，与陕南乃至四川境内的古道网络相连，北面入口靠近子午峪保护总站，地理位置优越。

该区域紧邻终南山，处于秦岭南北气候过渡带，兼具北方干爽气候与南方湿润植被，为古道通行创造了适宜的自然条件。周边山林植被繁茂、水源充足，既满足过往商旅饮水需求，也为古道沿线驿站和村落发展奠定基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北人南下进山前的最后一站、南货北上前往长安的第一个关卡，天然具备成为交通枢纽的潜力。

##### 2.1.2 起源、发展、繁荣与衰落的历史进程

南豆角古道的历史脉络与朝代更迭、商贸政策及交通变迁紧密相关。其雏形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秦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设立杜县，此地因处于县境边角，得名“杜角村”，后因长安方言中“杜”与“豆”读音相同，逐渐演变为“豆角村”，成为古道早期形态。战国时代，张仪率军从此向南进军攻打蜀国，开启了古道的军事应用先例。

秦汉时期是古道的发展阶段，楚汉相争之际，刘邦被封为汉中王，经由古道踏入子午峪，“火烧栈道”迷惑项羽，为“暗度陈仓”创造条件，使古道在军事史上留下浓重一笔。西汉时期，全国统一促进南北商贸交流，古道成为关中和巴蜀之间物资转运的关键通道，南豆角村逐渐出现驿站的初步形态。

隋唐时期，古道进入繁荣巅峰。盛唐政策开放、商贸兴盛，此路成为南北物资流通的黄金通道。唐玄宗时，因杨贵妃喜爱荔枝，特意开辟“荔枝道”，岭南荔枝经此快速通道送往长安，留下“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

来”的历史记载。当时的南豆角村商铺林立、宾客满堂，仅客栈就有二十几家，饭店四十余间，“商铺多，货物多，宾客多”成为常态，且融合了汉调、道情及本地眉户剧，文艺气息浓厚。

宋元至明清时期，古道持续发挥作用，明末南豆角村修建城墙和城门，进一步强化了其关隘和驿站功能。上世纪五十年代西万公路通车后，现代交通因高效便捷的特点，逐渐取代传统古道的商贸和交通功能，南豆角古道随之衰落，归于平静。

#### 2.2 古道核心历史遗存概况

##### 2.2.1 物质遗存

南豆角古道的物质遗存类型丰富，是历史的真实见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村内南北两座城门楼。城门楼始建于明末时期，2018年被列入西安市文物保护单位，属于西安市优良近现代建筑。南门楼门楣刻有“南极增辉”四字，券门深4.8米，由青砖和石条砌成，木质门框外包铁皮并以泡钉加固，虽布满锈迹仍坚守原位；北门楼门楣“胜利门”三字承载着特定历史记忆，门洞内部有六根防震铁栓，彰显古代工匠的智慧。两座门楼相距二百多米，连接着上千年历史，还是电视剧《装台》的实景拍摄场地，村史馆中至今保存着拍摄时的老照片。

村子南边约百米处，有两株树龄高达1500年的千年古柏，属于陕西省特级名木古树，堪称“活化石”。其中较高一株高18米、胸围3.5米，枝丫交错，形似久别重逢的老友相拥。古柏旁竖立着刻有“洪山镇定风水”字样的石碑，树下有一尊“社公爷”石雕头像，面容饱满、眉眼清晰，虽仅存头部，仍寄托着村民的信仰。古道周边还保留着古街道遗迹、废弃商铺客栈旧址、石子铺成的“子午道”字样，以及隐约可见的古道路面和排水设施遗迹，默默诉说着昔日的繁盛。

##### 2.2.2 非物质遗存

古道的非物质遗存丰富，承载着村民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基因。“社公爷”传说在民间广泛流传，一说其为教民耕种的后稷，露头守望田地；二说其为爱民如子的县令“舍公”，古柏也因此被称作“舍公柏”，两种传说体现了村民对农耕文明的敬重与对善治的憧憬。

古道保留着独特的民风民俗，村民对千年古柏的敬仰之情代代相传，从不捡拾其掉落的枯枝烂叶，部分村民会将较大枯枝制作成工艺品，所得收入分配给村集体和贫困家庭，这种

保护与分享的习惯是古道文化鲜活传承的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互辉映，共同构成了南豆角古道的文化核心。

### 3.南豆角古道的遗存勘察与口述历史采集

#### 3.1 文献收集与整理

3.1.1 地方志、古籍中关于南豆角古道的记载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王赴任时，由杜南进发，穿过蚀中地带，每过一处就焚毁栈道，防止其他诸侯趁机偷袭，向项羽表明自己并无东归之意。”[5]《汉书·王莽传》（元始五年，即公元5年）记载：“这年秋天，王莽因皇后生下子嗣而得到吉祥之兆，于是开通子午道，子午道自杜陵一直穿越南山直达汉中。”[6]《元和郡县图志·京兆府·长安县》（唐代李吉甫撰）提到，子午道有新旧两条线路，两汉至晋朝沿用旧道，南北朝时期开辟新道；其北方入口位于长安城南，南方终点在南豆角村，此处是抵达山谷前的关键驿站与聚落，唐朝时属于荔枝道（子午道的分支路段），也是进入长安之前的最后一站[7]。《长安志》（北宋宋敏求著）记载：“子午谷全长六百六十里，其北端入口称子口，距府城南约百里，南端出口叫午口，位于汉中府洋县东面一百六十里处，这是两汉至三国时期的古道。”[8]

清代嘉庆时期的《长安县志》明确记载了南豆角村和北豆角村，因长安话中“杜”和“豆”发音相同，秦代开始被称为“杜角村”的杜县西南角聚落，被误写成“豆角村”。该志书还提到南豆角村位于子午道北口处，建有南北两座城门楼，明末开始修建，是关中去往陕南、巴蜀的必经之处，清代成为商贸和驿站的重要通道，左宗棠西征时曾对这段道路进行整修[9]。《咸宁县志》（清·洪亮吉等编写）与《长安县志》相互补充，记载南豆角村属于咸宁县子午镇所辖，是子午道北口的第一个村子，设有铺递和汛防（清代基层军事组织），承担着子午谷交通及治安保障任务，村落保留了南北两个城门，是清代村级防御建筑较为典型的遗存[10]。《陕西通志》（清·贾汉复等编写）将子午道列为“蜀道北四”（子午、倪骆、褒斜、陈仓）之首，南豆角则是北口的总枢纽，衔接长安到子午峪的官道，是陕南贡赋、巴蜀商品进长安的关键转运之处，明清两代商贸十分兴盛，被誉为“子午古道第一村”[11]。

3.1.2 碑刻铭文、官方文书的搜集与校勘

在地方志和古籍构筑的宏观架构下，残存在地面及民间的碑刻、文书提供了生动细致的

微观史料。通过实地考察，重点记录村里留存 的物质文献，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村口两株 树龄约一千五百年的古侧柏，以及紧邻的“社 公爷”（“舍公”）石雕像。古柏旁立有现代 保护标志牌，石像承载着对司掌农业的后稷的 崇拜或“舍公爱民”的民间故事，是镌刻在自 然和石材之上的村落集体记忆与精神图腾文 献，实物证明了此地长久的聚居历史以及对农 耕文明的信仰。

3.1.3 文献资料的分类梳理（商贸、文化、 交通、社会维度）

商贸维度的文献主要记载该地作为物资 集散中心的情况，口述史料提到，20世纪50 年代西万公路通车之前，村里仍商旅不断，街 道“遍布客栈商铺”，流传着“商铺多，货物 多，客商多”的“三多”说法。文献记录了村 民农闲时去南山当脚夫，来回运送棉花、布匹、 食盐、四川土特产及西安火柴厂火柴匣子等 经济活动，这些都是认识古道民间商业活力的 重要资料。

文化维度的文献重点展现了交通枢纽带 来的文化交融及地方文艺的兴盛。文献提到， 为迎合来往商客的娱乐需求，陕南的汉调、道 情及当地眉户、秦腔等戏曲类型在此汇集交 流，催生了许多著名的秦腔艺人，如今仍存的 村自乐社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当代传承。此外， 有关“社公爷”的石像信仰以及村民对古柏的 敬重（不采摘古柏枝条作柴火），形成了地方 特有的民俗信仰文献。

交通和军事方面的文献资料丰富，覆盖从 古至今各个时期，汉代有国家驿道，三国时期 存在军事孔道，唐代有荔枝贡道，即便1958 年现代公路建成后，这些道路的交通骨干地位 下降，但各种史志及回忆录仍勾勒出道路职能 随时间推移的清晰脉络，南豆角村城门楼保留 的军事防御遗迹，便是此类文献的实物佐证。

社会维度的文献散落于村落空间叙事和 口述历史中，古城门洞成为村民日常纳凉的公 共空间，千年古柏树下是代代孩童嬉戏、商旅 歇息之处，这些表述共同塑造起古道村落的社会生活画面。村民对古柏断枝的处理所体现的 集体所有与公益分配理念（将制作工艺所得 收入分给村集体、困难户及个人），亦是地方 社会治理与伦理观念的生动记载。

#### 3.2 口述历史采集与整理

3.2.1 采集对象

采集对象包括不同年龄段的村民、文化传 承人、村干部等关键人群。村民涵盖不同年龄

段,形成记忆的纵向轴线。高龄长者(60岁以上)为核心信息源,他们或亲身经历,或通过父辈口耳相传保留了相关记忆,包含古道功能兴盛时期(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交通、商贸及日常生活细节;中老年村民(40-60岁)多数目睹了古道交通功能下降、社会变革的进程,其记忆对认识古道近代转型至关重要。

文化传承人多为通晓地方戏曲、民歌、手工技艺及祭祀仪式的艺人或主持者,他们是古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承载者,其记忆不仅关乎技艺本身,还蕴含着古道文化交流和信仰传承的核心要义。

村干部是村落发展的参与者和经营者,了解古道沿线遗存的保护情况、村落规划对古道的影 响及村民对古道文化的集体认知,可为研究提供现实参照。

### 3.2.2 收集核心内容

收集核心内容包括商贸传说、驿站故事、民俗传统及生态规约等活态记忆。

着重收集古道商贸活动的民间传说、知名商队的传奇经历、商贸纠纷的解决故事等,具体描绘交易场景、货物议价方式、支付手段、商铺经营模式,细致刻画典型商品的流通细节(如川茶入陕的包装方式、关中特产的销售渠道),搜集商贸活动催生的俗语、行话等,充实文献未记载的微观商贸图景。

关注古道驿站的经营场景,围绕古道相关的民俗活动展开叙述采集古道沿线生态保护的传统,如禁止乱砍滥伐、保护水源的乡规民约,村民利用古道周边自然资源的方式(采药、砍柴的路线与禁忌),考察古道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植被覆盖、河流流量的变化等),展示古道与区域生态的互动关系,为当代生态保护提供历史参考。

## 3.3 文献与口述的双重证据对应关系

### 3.3.1 互补性

物质遗存可证实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如驿站遗址与马帮歇脚的传说相互印证。南豆角古道沿线的物质遗存是历史发展的实体见证,为村民讲述的民间记忆、历史传说提供了可考的实物依据,增强了口头叙述的史料真实性与可信度。古道保留的驿站遗址、拴马桩、饮马槽等遗存,与老年村民讲述的马帮歇息、驿站经营的物质遗存可证实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如驿站遗址与马帮歇脚的传说相互印证。南豆角古道沿线的物质遗存是历史发展的实体见证,为村民讲述的民间记忆、历史传说提供了可考的

实物依据,增强了口头叙述的史料真实性与可信度;南豆角村的城门楼、防火陶盆、消防水井等遗存也与村民讲述的古道安防、防火传统相符,为口述历史中有关古道日常守护、生态规约的内容提供了实物支持,化解了民间口述的模糊性和主观性。

### 3.3.2 补充性

口述历史用以填补物质遗存所含信息的空白,如商贸流程、习俗细节等。物质遗存能保留部分历史痕迹,但难以展现具体的历史进程、人文细节和应用逻辑,口述历史作为活态史料,恰好填补了这种信息空白,使物质遗存的历史价值得到更好解读。就古道商贸相关遗存而言,文献仅简单记述了商贸繁盛的大致情况,而口述历史补充了具体的商贸流程、交易讨价还价方式、商铺经营细节等内容,使商贸遗存的功能作用更加形象化;对于古道防火、民俗活动相关的遗迹,实物只能显示设施存在、活动举办的事实,而村民和传承人的讲述,能细致重现防火规则的执行流程、民俗仪式的各个阶段及不同时期的实施变迁,进而丰富了物质遗存背后的人文底蕴,生动再现了古道的历史氛围。

## 4.南豆角古道的文化内涵挖掘

### 4.1 商贸文化:南北物资流通的历史印记

#### 4.1.1 物质遗存佐证

古城门内外的街道曾是繁华市集,商店、杂货铺、饭馆鳞次栉比,“中心街”(现老街)位于南北城门之间,长约200米,是“旱地码头”繁华景象的见证。现存的南北两座城门楼是商贸活动的核心地标,北城门刻有“南极增辉”,南城门据记载有“终南毓秀”,还有一副直接体现其商贸功能的对联:“兵用新谋进退无常操胜算,商通古道取舍有度显富图”。南北城门楼本身是商贸活动的守护性建筑,门洞深阔,洞深达4.8米、宽2.5米,可通行车马;村子南边尚存有古商道遗迹,子午峪内保留着一座长约4米、由三根完整石条搭建而成的古桥,对保障商旅通行至关重要。

#### 4.1.2 口述历史补充

口述历史补充了马帮的往来路线、货物交易的习俗以及对商贸集市的记忆。马帮常行走于高山峡谷之间,足迹遍布云南、四川等地,形成独特的马帮之路,这些路线或穿越原始森林,或经过高山草甸,或跨越激流险滩,蕴含丰富文化内涵。货物交易方面,马帮携带的货物多种多样,从盐巴、茶叶到药材、绸缎等,往往按一定规律交换货物,当地居民也会参与

其中，形成独具特色的交易习俗。商贸集市热闹非凡，每逢集市日，村民纷纷涌向集市买卖各类物品，商品琳琅满目，既有农民自家种养的瓜果蔬菜，也有商贩贩卖的生活用品和特色小吃。

村民回忆，以前南来北往的商人众多，街边店铺鳞次栉比，不乏外地人开设的店铺，虽交易货物无确切文字记录，但此地作为进出秦岭的要塞，山货、药材、盐布、日用百货等应为主要交易物品。这里还是马帮经过的路线，南豆角村是子午古道上的关键节点，马帮有着严谨的组织架构（包含大锅头、二锅头、管事等职位），骡马队伍存在“头骡、二骡”之类的顺序，且常唱《赶马调》等民歌化解旅途辛劳。

#### 4.1.3 文化内核

南豆角的商贸文化核心源于地理枢纽地位所激发的坚韧民间商业活力，村落因道路而兴盛，构建起一套针对流动商旅的完备地方经济体系，包括住宿、餐饮、货栈及骡马服务等，在古代交通经济对地方社区的滋养方面具有典型意义。崎岖的山路和不稳定的商流促使本地居民具备灵活应变能力并提供综合性服务，体现出民间经济强大的韧性。商旅往来也是语言、饮食、信仰等文化要素传播的过程，使南豆角成为秦岭南北文化交融的前沿地带。

### 4.2 生态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

#### 4.2.1 物质遗存佐证

物质遗存可佐证古道的选址布局、古桥的营造工艺以及周边遗留的植被情况。村庄坐落在子午峪口处，“先有南豆角，再有子午道”的民谚，表明选址时着重考虑了山缘和平原相接的稳定地带，便于通行和居住。村子当中有一座凭借独特石拱造型走红的“网红桥”，体现了因地制宜的营造智慧；城门门栓洞存在高低差别，据说是因南北水势大小不同而特意设计，是顺应局部小环境的表现。村口的两棵千年古侧柏（树龄约1500年）是活的生态地标，原先种在古寺“但培寺”大门前，寺庙虽已倒塌但树木留存，成为村民共同回忆的寄托，其存活是生态保护成果的体现。

#### 4.2.2 口述历史补充

古柏树下有一尊“社公爷”石像，民间又称“社工爷”或“舍公”，据说为周代农官后稷，头部裸露在外是为监督民众按时收割耕种，代表了生态知识的人格化，由此产生“算黄算割”的鸟鸣传说，成为指导农事的生态时节规范。古柏旁矗立着一块康熙六十一年设立

的“洪山镇定风水”石碑，显示出古人借助信仰仪式祈求镇水防山洪爆发的生态经营意识。

#### 4.2.3 文化内核

南豆角所蕴含的生态智慧，表现为一种“信仰-实践”相融合的乡土知识体系，既包含具体实用的农事节气知识（如收割时机），也融入防灾避害的美好愿望（如抑制山洪爆发），这些内容依托“社公爷”等神圣形象，使生态规范具备超自然的威严，得以代代传承。古柏树和石像共同形成的“二柏一石头”景致，成为村民聚集聊天的地方，将生态保护与社区公共活动、历史归属感紧密结合，逐渐转变为村民内心深处的守护信念。从村落选址靠近山谷出口的平缓之处，到房屋建造时的适宜性设计，均体现出利用自然环境、避开自然灾害、谋求长久延续的全面性生活理念。

### 5.南豆角古道文化价值的当代阐释

南豆角古道位于子午道北端，是通往秦岭的重要关口，历经千年历史沉淀，连接关中平原与陕南巴蜀的文化，作为古代交通遗迹，在现代社会具有多重意义，既是文化传承的媒介、生态智慧的体现，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力量源泉，其文化传承功能得以保留，还能为经济发展助力，如今人们重新认识并激发其当代价值，为传统遗产的活化传承提供了鲜活范例。

#### 5.1 文化传承价值：乡村文化记忆的载体

南豆角古道的文化传承价值源于其作为乡村文化记忆承载者的独特性质，历经两千余年时光变迁，目睹了朝代更替、商贸交流及民俗融合的全过程，将历史事件、生活智慧和精神信仰积淀为可触摸感知的文化财富，构筑起联系村民身份认知与情感依归的心灵纽带。

古道遗留的物质部分成为乡村文化记忆的实体表现形式，南豆角村作为子午道北端第一个大型驿站和关隘，保留了南北两座古城门楼，村口两株虬枝盘旋的千年古柏，为陕西省级特级名木古树，历经1500年岁月洗礼，既是过往商旅歇脚之处，也是村民童年嬉戏乐园；树下的“社公爷”后稷石雕头像，代表司掌农业的精神寄托，承载着村民对农耕文明的敬重与传承意愿，形成“两柏一石头”独特精神图腾，成为古道文化记忆的关键标志。

古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着乡村的精神血脉，南豆角古道作为南北文化交融的关键之处，曾汇集陕南四川的汉调、道情及当地眉户等剧种，为过往商人提供娱乐，催生了秦腔名家安鸿印等艺术人才，这些戏曲文化流传至

今,村里的自乐社在当地乃至西安全具有一定名气。古道留存的多元历史记忆颇具特色,从《汉书·王莽传》记载的子午道开凿,到三国时期魏延“子午谷奇谋”军事规划,再到盛唐“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驿道的神话传说,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痕迹在此交织融合,形成多层次文化积淀。

### 5.2 生态借鉴价值: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应用

南豆角古道所蕴含的传统生态智慧,源于古人长期与秦岭自然环境相处形成的生存哲学,包含“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的营造理念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在当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古道既是南北方连通的交通要道,也是体现传统生态智慧的鲜活范例,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历史依据。

古道的生态廊道功能体现了传统交通设施与自然生态的共生关系,南豆角古道穿行于秦岭北麓生态敏感地带,沿途分布着千年古柏、百年板栗等古树名木,构筑起连接村落与山林的生态桥梁。这些古树既是古道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区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鸟类、昆虫提供栖息之所,维护局部生态稳定。古人长期利用古道时,已具备自发的生态保护意识,南豆角村人对千年古柏心怀敬意,不擅自砍伐,也不用其残叶断枝当柴火,这种质朴的生态观念使古树历经漫长岁月仍巍然屹立。这种“敬畏自然,守护家园”的生态智慧,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高度契合。

### 5.3 经济赋能价值:助力乡村文旅发展的资源基础

南豆角古道拥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和独特的生态资源,成为推动乡村文旅发展的关键资源根基,在激发乡村经济活力、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古道的资源禀赋为乡村文旅发展提供了核心竞争力,南豆角古道具备“古道+古村+古树+古建”的复合型资源优势: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留存军事、商贸、文化等多种痕迹,南北城门楼、古街道等历史建筑保存完好,千年古柏与“社公爷”石雕构成独特精神象征,加之靠近秦岭子午峪的自然优势,形成兼具历史庄严感和自然清幽气息的文旅资源融合体。

古道的经济赋能价值,更体现在对乡村振兴的全方位带动上。文旅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经济收入增长,还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完善和公共服务提升。为满足游客需求,南豆角村完善了村内道路、导览系统等设施,村容村貌得

到改善,这些设施的提升直接惠及当地村民。更重要的是,文旅开发激发了村民的文化自信和参与热情,村民自发投身古道保护、文化传承及旅游服务,营造出“人人都是文化代言人,人人都是旅游参与者”的良好局面。村史馆的建设、文化剧场的运营、手工艺产品的开发等事务,均需村民积极参与,这种社区共建共享的模式,既保障了文旅发展的可持续性,又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古道文旅的发展提升了村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资源注入乡村振兴,为产业升级、人才回流营造了良好环境。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在“文献+口述”双重视角下,南豆角古道的核心文化价值被系统发掘并清晰呈现。物质层面,明清城门楼、千年古柏、左宗棠整修的石拱桥等遗迹,彰显了其作为子午道北端关键节点的军事和商贸意义;非物质层面,“社公爷”信仰等鲜活记忆,留存着农耕文明与南北文化融合的轨迹;作为贯通关中地区和陕南巴蜀之地的文化路线,古道成为承载诸多历史场景及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三者共同构成了古道“物质遗存-非物质传承-路线枢纽”的核心价值体系。

口述历史为文献记载提供了重要补充,极大提升了古道文化内涵的具象性和鲜活度。发掘出“社公爷”的多种传说、古柏守护习俗及戏曲融合回忆等非物质文化内容,填补了民俗信仰、日常生态规约等方面的研究空白,且印证了物质遗存的历史功能,使古道文化从“静态遗存”转变为“活态叙事”,形成“文献验证+口述完善”的立体文化认知体系。

### 6.2 研究不足

实地考察存在明显的范围与深度局限。范围上,考察重点集中于南豆角村核心聚落及其周边近处遗迹,未全面涵盖古道延伸至子午峪山谷内部、与陕南相接的路段及沿途相关驿站、商道节点等地,难以完整呈现古道线路的空间连贯性和文化景观的整体性;深度上,部分珍贵文献难以获取,限制了研究向纵深推进。

### 6.3 未来展望

在推广研究成果方面,总结着手于构建的“文献考证+口述采集+价值转化”综合研究框架,提炼古道文化挖掘和保护的关键经验,为国内其他类似历史古道及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方法论和操作范例;通过

发表学术论文、分享研究报告等方式，推动古道文化价值在学术界传播、在全社会知晓，为相关保护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在拓展应用方面，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把子午古道沿线村落、秦岭生态保护区等资源整合起来，形成“点线面”关联的整体文化复兴格局。

### 参考文献

[1]刘麟鼎.如何推动历史村落发展——以西安南豆角村为例[J].乡村振兴研究, 2020, 15(3): 45-52.

[2]陈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景观改良加强研究——以秦岭北麓南豆角村为例[J].景观设计, 2021, 18(2): 67-73.

[3]冯思远, 杨湘涛.论子午古道的文化景观旅

游价值[J].旅游学刊, 2019, 34(7): 89-96.

[4]王曼利.子午道的古今价值论[J].历史地理研究, 2018, 35(4): 102-110.

[5]司马迁.史记[M].裴骃集解, 司马贞索隐, 张守节正义.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6]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7]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8]宋敏求.长安志[M].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9]长安县志编纂委员会.长安县志[M].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9.

[10]洪亮吉, 陈大经, 杨生芝等.咸宁县志[M].清乾隆年间刻本.

[11]贾汉复等.陕西通志[M].清康熙年间刻本.